

生活的道路

伦沙万 著





生活的道路

〔老挝〕 伦沙万 著

梁继同 戴德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生活的道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 5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1}{4}$ 插页 2

1975年6月北京第1版 197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274 定价 0.24 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走向革命和解放的道路

——代序

嘹亮的战歌响彻云霄，熊熊的反帝斗争烈火燃遍大地。长期以来，老挝人民在老挝爱国战线的领导下，不畏强暴，团结奋斗，为了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反对外来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这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涌现出多少英雄人物啊！老挝的爱国文艺工作者也积极地投入了这一火热的斗争，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生动地描绘了老挝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揭露了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罪行，热情讴歌老挝人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揭示了这场正义斗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中篇小说《生活的道路》就是这些作品中的一部。作者伦沙万是在寮国战斗部队中成长起来的，他通过革命的斗争实践，以朴素有力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老挝人民生活和斗争的画图，我们读起来感到格外亲

切和激动。

《生活的道路》描写一个深受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欺凌、压榨的老族少年铤，在抗击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英勇斗争中，在老挝爱国战线的哺育下，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锻炼，成长为一名老挝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战斗历程。铤的成长道路，是走向革命、走向斗争和胜利的道路，是革命的老挝人民战斗历程的概括。苗族的穷苦少年杜，走上这条道路，成为寮国战斗部队的炮手；女奴隶姬燕走上这条道路，成为老挝爱国战线驻富良山地区的妇女干部；铤的父亲走上这条道路，成为寮国战斗部队的一名军事干部……共同的革命目标，使千千万万老挝爱国人民走上了这条伟大的道路，大打人民战争，把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小说形象地告诉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铤是一个老族贫苦农民家的孩子。他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苦水中度过的。法国殖民主义者抓走了他的爸爸，苗族奴隶主夺去了他的妈妈的生命，他自己也沦为奴隶，饱受着压榨和欺凌。殖民主义者的暴行，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铤幼小的心灵中，深

深地播下仇恨的种子。他经常思索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土地上，为什么到处都有人欺压人，到处都有人象牲畜一样地尽被人拳打脚踢呢？为什么有的人就有钱有势，有的人要当牛做马呢？”面对着严酷的阶级压迫的现实，经过寮国战斗部队的教育，使他逐渐懂得了奴隶主把东和头人三卡之流之所以能够任意欺压和剥削劳动人民，是因为他们有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支持，“鞭子拿在人家手里”，要找活路，要摆脱奴隶的悲惨命运，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把殖民主义者驱逐出去，把把东之流的殖民主义走狗彻底打倒。走上革命道路的铤，“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对我们这样的穷苦人民来说，是多么地伟大呵。”“革命不单单拯救了我一个人，而是使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们，获得了解放。”铤的生活和斗争的道路，说明了人民要革命，革命靠武装斗争。老挝人民只有用革命的武装打倒反革命的武装，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近十多年来，老挝人民同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一道团结战斗，互相支援，又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1973年，签订了“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睦的协定”。1974年，成立了老挝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1975年，正式颁布了“十八点政治纲领”。这都是老挝人民长期坚持正义斗争的胜利成果。

中国和老挝是亲密的友好邻邦，中老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在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一贯互相鼓舞，互相支持。我们铁路工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一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老挝人民的正义斗争，正义的事业是永远不可战胜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老挝人民！

昆明铁路分局工人业余文艺评论组

1975年4月

“伊沙拉”*之歌

“勤劳勇敢的老挝人民酷爱自由、民主。他们团结一致，高举神圣的战旗，英勇战斗……”

一九五〇年十月的一个早晨，嘹亮的革命歌声第一次响彻了班纳村的上空。这是寮国战斗部队的叔叔们在热情地歌唱。

听到这动人心弦的歌声，我和几个刚刚钓鱼回来的伙伴，急急忙忙地把鱼竿丢在各自的房前，一窝蜂似地朝着歌声的方向奔去。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会场。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飘扬在庄严的主席台上的三块彩布；在主席台帷幕上，还并排悬挂着三幅半身像和用老挝文写成的横幅标语。

台前，站满了部队战士和拥挤的人群，他们正聚精

* “伊沙拉”，寮国自由阵线的音译，是老挝爱国战线的前身。——译者注

会神地听着主席台上的一位军事干部的讲话，我也很注意地听了起来。其中有些话，什么“全民团结”，“自由”，“民主”……，我听来听去也听不懂。这些词，就连我的父母亲，也从来没有讲过，我压根儿也没听说过。

我们这几个小孩子，在讲台下，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就不声不响地钻进了大人堆里去，想往坐在靠近主席台的那帮伙伴跟前凑。大人见了，一个劲儿地向我们咧嘴使眼色。可是我们却不管这一套，仍一个劲儿地往前挤。不一会儿工夫，我们就挤进了小伙伴们中间去了。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一来，讲台上的那位军事干部的话听得更加清楚了。他说：

“……由于有了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十二日，我们的部队和人民，才有今天这个机会，在这里集会，庆祝这一光辉的历史节日。”他继续说道：“……为了保卫这些成果，首先，我们各族人民必须团结在以苏发努冯亲王为首的寮国自由阵线周围。同时，我们还必须同越南人民和高棉人民的革命力量，紧密配合，打击我们的共同敌人——法国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使我们三个民族获得独立、繁荣和幸福……。”他一边说一边打着手

势，话音是那样地铿锵有力：“尽管我们人民的斗争还要经过长期的艰难困苦，但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法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必败！”这时，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仔细地看了一下讲话的这位叔叔。他是一个中等身材、面颊消瘦的人。他身上穿着一套褪了颜色和带着许多补丁的旧军装。然而，这一切却丝毫没有使他那久战沙场的风貌受到损失。他那悦耳动听的言语、和蔼可亲的姿态，有力地吸引着我。尽管他说的有些话我不大懂，可是我却打心眼里爱听。他就是住在我们家里的占塔叔叔。

我一边听，一边仔细地打量着占塔叔叔的面孔和身材。我有时仰起头来，贪婪地望着主席台上的画像，望着周围。这里的一切，对我是那样的新奇、有趣，也是我们村的人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悄悄地向站在我身后的一位叔叔问道：

“叔叔，那三块布是什么玩艺儿？”

“谁说是布，国旗嘛。是老挝、越南、高棉三国国旗！”

“那几张像片呢，是谁呀？”

那位叔叔微微笑了笑，说道：

“是这三个国家的革命领袖，中间的是我国人民的敬爱领袖苏发努冯亲王，右边的是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左边的是高棉革命力量的领导人。”

“呵，他们的照片真好看！”我自言自语地叫了起来。那位叔叔的话我都没有听清楚，特别是“革命，人民……”，就更不知道它的真正意思了。

我还有很多话想问他，突然一阵有力的口号声，打断了我的思路：

“老挝人民的独立、统一、富强万岁！”

“‘十·十二’精神万岁！”

“老挝、越南、高棉联盟万岁！”

“苏发努冯亲王万岁！”

“胡志明主席万岁！”

“……！”“……！”

会场上的人们，一齐跟着高呼：万岁！万岁！雷鸣般的欢呼声，响彻上空。

我们也跟着呼喊。口号声刚一结束，会场上立刻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跟着是“伊沙拉”部队唱起了“老挝是老挝人民的”的歌声。听到这悦耳的歌声，我和其他小伙伴们一样，心里是那样地兴奋、激动。我们不会唱，只好随着那歌声的节奏，一个劲地跟着叔叔们打拍

子，手都拍红了。有些调皮的孩子，张着嘴巴，哼哼唧唧地装出一副会唱的样子来。我看了，心里真急得慌，便向一个伙伴问道：

“你也会唱吗？”

“唉，不会就跟着哼呗，哼久了，不就会了嘛！”

歌声响亮，掌声不绝，还夹杂着欢乐的笑声，真是热闹得很。我一边鼓掌，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部队的叔叔们。他们身穿旧的、满是补丁的、草绿色军装，头戴圆形帽，个个笑容满面，精神抖擞。

自从“伊沙拉”部队进驻我们村以后，三个月来，没有一天听不到歌声和掌声，特别是在村长建丹大伯家。这里是乡政权的中心，每天人来人往。白天，乡政权在这里开会和办公；晚上，是村里的男女青年和孩子们的俱乐部。他们在这里听新闻、学文化、学唱革命歌曲。三个月来，班纳村始终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就连过去拿着烟袋围在火炉旁一心抽烟的老人，或只知忙于家务的大娘大婶，现在也显得格外年青了，其中也包括我的爸爸和妈妈。

近些天来，不知怎么回事，爸爸经常不在家，从地里干活回来，一吃过晚饭，人就不见了。你如果想要找他，只要到建丹大伯家里去跑一趟，就能找到。也许是

建丹和建迪伯伯交给他什么任务了吧？

“伊沙拉”部队叔叔们，每星期还要在场院里举行一次娱乐晚会。每到这一天，我们全村的小孩子是最高兴的。当篝火燃烧起来的时候，村里男女老幼，都伴随着战士们的有节奏的掌声和优美的歌声，围坐在火堆的四周，开始联欢活动。我最感兴趣的节目，是跳“拉翁”舞。歌声和着长鼓声响了起来，一对对男女青年兴高采烈地围着篝火翩翩起舞。老人们，也不甘落后，他们各自表演着自己的拿手节目。娱乐晚会一直进行到深夜，人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近些天来，村里的面貌焕然一新：清晨，全村的大街小巷，村头巷尾，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竹楼下堆满的牛粪，也不见了。叔叔们挨门挨户，进进出出，忙个不停。他们有的挑水，有的打扫场院，有的在竹楼下帮助大婶们舂米。傍晚，在回村的路上，只见叔叔们身上背着柴捆，边走边亲切地同村里人拉家常。

住在我们家里的是占塔、习汶和桑淀叔叔。我们家里，从来不把他们当成外人看待，他们也象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每天，叔叔们工作以后，就去打柴，挑水，舂米，喂猪喂鸡，跟着我们一块操劳。妈妈越是阻拦，不让他们干，他们就越干得欢。不仅这样，他们还给我

家编了许多竹筐。最使我着迷的是，占塔叔叔会做鱼钩，还是个钓鱼能手。我整天跟着他寸步不离，几乎每天晚上，我都死死地缠着他去钓鱼。如果哪一天占塔叔叔有事，去不了，我就撅着嘴巴生他的气。每逢这个时候，占塔叔叔总是抚摸着我的头，哄着我说：

“等明天傍晚叔叔带你去，而且到鱼最多的地方去钓。叔叔今天有事去不了嘛。”

近来，建迪大伯和村里的人们一样，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每天一趟又一趟地东走走，西串串，逢人便夸“伊沙拉”部队是怎样怎样的好。他经常去的地方是建丹大伯家。无论开什么会，头一个见到的就是他。我有好几次在建丹大伯家听干部讲话，都听见他说：“现在，我们班纳村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发言权，都当家做了主人，谁也不敢再象过去那样欺负我们了！可是，如果我们想要保住这个新生的政权，不让它再次被法帝国主义者和头人们夺去，我们就要团结起来，同部队指战员密切合作。”说到这里，大伙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是的，村里人都深深感到，建迪大伯的每句话，都同部队首长、战士讲的一样，字字句句都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

自从闹革命以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伊沙

拉”部队进入班纳村的那天起，人民才有了安静的生活。村里的哭喊声、打骂声和头人们收租逼债的怒骂恐吓声，再也听不见了。全村呈现一片快乐的新气象，建迪大伯更是心情舒畅。这些天来，他仍然每天去服侍乡里的头人三卡。部队叔叔们把他那间又矮又小的茅草房，整个翻修了一次。修房子的那天，五十八岁的建迪大伯边往房上递草，边用袖子擦着那流在干瘦的脸上的热泪。

正当全村的穷人都在欢天喜地的时刻，头人三卡却象一只刚生下来的鼯鼠一样，躲在窝里缩成一团，不敢出来见人。特别是新的乡政权成立后，曾把他叫到建丹大伯家里，对他进行了一次警告以后，他的脸色，表面上已不那么凶恶，也不见他打骂家里的佣人了。真不知道这新政权的威力到底有多么大，它竟能这样快地使一个人的态度有所改变。

但是，有件事，却使人还没有看透肉泡眼三卡的内心。在寮国战斗部队叔叔们面前，特别是在武装宣传连连长占塔叔叔面前，三卡总是低头哈腰，就象狗见了主人一样的温顺，满嘴甜言蜜语，吹吹拍拍，搞得占塔叔叔十分讨厌。但在背后，三卡却又摆出一副阴森可怕和仇恨的凶相来。他仇视占塔叔叔和“伊沙拉”部队，更仇

视建丹和建迪大伯这些乡政权的头头们。他对他家里的佣人和村里一些耳软胆小的人，进行各种威胁。他说：“对新政权，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以后，法国人回来，这些人都要溜掉的。到那时候，出了什么事，我可就不替你们负任何责任了！”他边说边用眼睛盯着大家，进行心理恫吓战术。

事情也真的象他所说的那样，正当村里人欢庆这新生政权时，“伊沙拉”部队却在乡亲们依依不舍的气氛中离开了我们村。

那是冬季的一个傍晚，阴暗的天空笼罩着班纳村。村里显得格外凄凉寂寞。到今天，想起当时那依依惜别的情景，还使我记忆犹新！

听说部队要走了，全村的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跑来团团围着他们，抢着他们的行李和背包，前簇后拥，把他们送到村边。我也跟着送行来了。我抬头一看，只见乡亲们个个都流着眼泪，尤其是我的妈妈、袍大娘、坎丹大娘这些老人更为难过。青年们则沉默不语，他们站在那里，一个劲儿地用手帕擦着眼泪。老人们把用芭蕉叶包好的饭团和烤鱼，象给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送给了部队叔叔们。年近六十的西老大妈，走到布立叔叔面前，抓住他的胳膊难过地说：

“孩子，你们走了，可别忘了回来看看我呀！我年纪大了……”

乡亲们都拥到了部队叔叔们身旁，有的再三再四地嘱咐，有的向亲人递赠手帕……。叔叔们激动地从乡亲们手里接过了背包，背在肩上，整装待发。建迪大伯紧紧地握着占塔叔叔的手，哽咽着：

“祝你们一路平安，多打胜仗！不管怎样，不要忘记了班纳村，任务完成后，一定回来呵！”

这时，占塔叔叔代表全连指战员，向前来送行的乡亲们告别说：

“乡亲们，我们就要分别了，首先让我代表全连指战员，对你们给予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示深切地感谢！”占塔叔叔的每句话都是那样地亲切有力，他握着建丹大伯的手，继续高声说：“今天，我们虽然离开了这里，可是革命政权依然是我们人民的。这个政权不能存在下去，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能负起捍卫它的责任来。我们不久就会回来的，请乡亲们耐心地等着我们吧！”

随后，占塔叔叔来到我爸爸妈妈跟前，凝视着我爸爸，然后说：

“我们就要走了，一切工作都交给你和乡亲们了。”